

资本逻辑、发展风险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何小勇

(西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资本逻辑在整体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推动现代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正是当代种种发展风险生成的内在机制。当今人类文明所遭遇的风险境况表明,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可欲性、合理性和正义性。应对无人能幸免的风险挑战,消弭贫富阻隔和对立,以人本逻辑反思并超越资本逻辑,重建被资本抽象化了的生活世界,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新辩护。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逻辑;发展风险;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5)05-0012-07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5.05.002

当今著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Gerald Allan Cohen)2009年出版了名为《Why not Socialism?》的小册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提出了“社会主义可欲吗”、“社会主义可行吗”这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正当性的阶级和经济论证还可靠吗、我们是不是该更多地转向并致力于对社会主义正当性的道德辩护这种问题的重新思考。本文以现代性运行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中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观点为依据,试图从当今全球性发展风险问题的生成机制及其超越这个角度,为思考社会主义的正当性问题探索既不同于科恩式的道德辩护又不同于传统的贫富分化话语的新空间。

一、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化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在各种领域和各种场合被普遍使用和热烈讨论,已成为无所不在的话语。全球化最一般的含义是指人类活动逐渐走出孤立、封闭的分散发展状态,摆脱民族、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形成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全面依存关系的过程和趋势。不管人们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和论说多么纷繁复杂,全球化首先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类实践的一个新阶段、一种新状况。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人类社会从地方性发展到全球性发展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变革,不能以对它的意识为依据,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中来解释。全球化或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活动和交往不断扩大的结果。全球化发轫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殖民侵略和贸易活动。“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地主所有者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研究”(批准号:14BZX018)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何小勇(1974-)男,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①。可见,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正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启动的。

现代性孕育了全球化并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本身是一个多维度、流动性的历史概念。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现代性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会问题,是现代性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特征,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现代社会中诸多方面的现代性不仅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与结果,同时也是资本逻辑的内在条件和内在机理,现代性就内涵于资本逻辑之中。现代性归根到底是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并且随着资本运动的扩张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力图在无限度、无休止的运动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的内在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②。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他的行动逻辑就是资本的运动逻辑。“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③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④。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它推动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张。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即当代的全球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使冷战时期的“半球化”在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和技术网络化的基础上跃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人类实践在内容、形式、影响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而当代全球化的“真相在于在现代性中,资本的力量及其主权的机构牢牢控制了历史,并对历史进程实施它们的统治”^⑤。资本要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必然要冲破地域、民族、国家的限制。“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⑥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⑦。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推动的全球化发展不仅要使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空间上占领整个地球,而且要使资本周转的时间尽量缩短。“资本一方面要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⑧。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化进程在时空关系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时空伸延”或者哈维称之为“时空压缩”的现象,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要求出发对全球化进程中时空关系的分析表明这种现象正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

资本逻辑不仅驱动着现代性在地理空间中的无限扩张,而且造成了全部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使资本逻辑向一切社会空间中广泛渗透,从而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服从于、服务于资本增殖自身的运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⑨,它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变成仅仅是工业的一个部门并完全由资本支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逻辑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把自然仅仅变成有用物和人恣意征服和掠夺的对象。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资本逻辑渗入政治领域使国家职能服从于经济增长,资本要求国家制定有利于资本扩张的经济政策。资本逻辑使精神文化产品通过工业手段生产出来,它利用大众传媒创造出虚假的、异化的、过度的需求,使消费过程变成消费者显示其自身能力、社会身份和地位、实现人格尊严和生命意义的过程,从而制造消费主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资本增殖自身的连续运动创造条件。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展推动着消费主义的全球蔓延,从而使当代社会成为“消费社会”,“消费、信息、文化和丰盛,所有这一切今天都由体制本身安排、发现并组织成新的生产力,以达成最大的荣耀。不过,它也从一种暴力结构向另一种非暴力结构转化(相对而言):它以丰盛和消费替代剥削和战争。”^⑩在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资本逻辑褫夺了人的感觉和特性的丰富性,“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⑪资本逻辑还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的人际交往领域,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⑫“资本已成为一个世界。使用价值和被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外的价值及定价过程的其他所有参照物已逐步消失。”^⑬资本逻辑打破一切与它无限增殖自身的运动相矛盾的自然的、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的限制,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多样化和交换普遍化的自然和精神障碍,从而在整体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

二、资本逻辑与发展风险

现代性的高度流变性和不确定性本身就隐藏着各种风险,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当代全球化情境中有增无减,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发展中的常态。对于当代全球性发展风险问题的具体生成机制从根源上进行整体揭示,必须从资本逻辑包含的内在矛盾在当代全球化发展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来加以说明。资本逻辑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不断社会化的趋势和财产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必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必须使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和环节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扩展和深化,因为资本所追逐的利润只能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吮吸活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生产力的进步使社会物质生产中分工和协作的规模和水平越来越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范围内进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人类共同劳动的成果,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生产力变为资本的生产力,生产过程及其成果都由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即资本家个人控制和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逻辑运动中的固有矛盾,资本的灵魂在于增殖而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资本运动的条件和活力都来源于社会。但这种社会力量却掌握在资本家个人手中,这就是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⑭资本逻辑就是在这个基本矛盾中运动的,并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当今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全球化社会发展仍然没有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和支配,毋宁说,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驱动着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能量向前突进。资本逻辑内在矛盾在当今时代的具体展开及其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就是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生成的内在机制。

1. 资本逻辑与当代经济金融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金融垄断资本向世界经济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的不断渗透,资本的所有形式和部分都已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并联结在一起,当代的全球化已经进行到了“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⑮阶段。金融垄断资本的独立性、贪婪性、投机性和寄生性借助于高度发达的现代通讯和信息技术在全球迅速游走以攫取利润,并使虚拟资本的数量及价值与实体资本相背离,从而大大加剧了资本运动链条突然断裂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和使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瞬间崩溃的可能性,全球经济形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充满风险。数字化的、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进行的金融交易本身就能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不断加快的发展趋势、非实物性的金融流通以及数字化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的种种条件,这一切尤其会触发完全无法控制的进程和后果,招致目前确实尚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种种灾难。”^⑯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世界市场和世界金融体系使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和关联度日益加强,任何主要市场主体的损益都会对相关者产生巨大影响,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变得比以往更为明显,它不时地转化为现实的金融危机并引发实体经济的危机。正如贝克所说,“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说明:我们是在与一种经济的‘切尔诺贝利’打交道。”^⑰对当代社会发展影响至深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并非现代信息技术和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全球蔓延的必然产物。

伴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在全球蔓延并进一步深化为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实体经济的低速增长与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之间的矛盾;各国经济的有组织、有管理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有组织性与世界生产的不平衡和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全球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市场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

尖锐化导致全球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失衡、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以致造成全球性的经济风险和危机。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扩大直接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都在不断加剧。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经济危机更多地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资本逻辑、资本主义自身的固有矛盾是造成当代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风险与危机最为深刻地根源,而非中国等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的低消费和高积累。

2. 资本逻辑与当代国际政治风险

随着当代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所包含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演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演越烈,在现代军事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给人类发展蒙上了阴影,成为当代全球性政治风险的根源。恩格斯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⑧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掌控着核心技术和巨额资本,处于组织、领导和制定规则的优势地位。它们纷纷把生产基地建在后发国家,并就近占领销售市场,在本土以外攫取高额利润,从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加大、矛盾和冲突激化。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获益很少。

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自由贸易的信徒并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⑨,“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⑩,“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⑪当代的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发展更加不均衡,这就使国际关系持续紧张,国际冲突甚至战争时有发生,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威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国家联盟本质上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以大力发展强有力的军事为垄断资本的增殖保驾护航,不难理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多都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创造出来并率先应用的。当今世界的军备竞赛并未消停,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实际上并未消除,而以各种名义和面目出现的恐怖主义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政治风险。2007年美国爆发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向全球蔓延,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评估发动战争来转嫁经济危机的可行性报告,抛出了以战争救市场的论调,战争无非是政治行动中最残酷的手段,这一事例足以使全球政治关系中的风险根源于利益争夺的实质昭然若揭。

3. 资本逻辑与全球文化风险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各种行动主体基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领域和层次不断地分化组合,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及其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势不可挡,其中交织着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矛盾。现代性就其文化价值维度的实质性内容而言包括注重现在、向未来敞开、主体性、理性化、科学、自由、民主、进步等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但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推动者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性精神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经历着普遍与特殊、社群与个体的内在冲突和张力。漠视世界历史进程中文明的多样性,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某种文化的原教旨主义都是全球化时代危及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风险源。文化作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战略服务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把反映资本逻辑、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文化价值观念打扮成普遍文化并凭借其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势在全球推广,“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全球化,导致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独白’文化的产生,或者说导致了一种文化话语的霸权主义的产生,而且这种文化话语霸权必然导致其他文化和这种权力话语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文化多元主义或者相对主义对文化普遍主义的抗衡。可以说,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是文化普遍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

果,是对愈演愈烈的文化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思想行为模式的激进反叛。由此可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异常激烈的时代。”^② 根源于资本逻辑的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当代社会发展中各个层面的文化风险的深刻根源。

资本要增殖就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进而就要不断地扩大产品的销路,这就要不断地开拓市场,刺激并制造出消费需求,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正是资本逻辑运动的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和组成部分。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③ 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凡是各种大众传媒能够触及的地方,无不充斥着花枝招展地诱惑消费的广告。曾经养育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俗禁欲主义新教伦理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被消费主义的娱乐竞赛所侵蚀和取代,“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④ 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化迫使一切民族和国家推行有利于资本增值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这就必然导致全球范围各种力量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侵蚀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强化其全球文化战略,它们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标榜为人类共同利益,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完美至善的普世文化向其他民族国家推行,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世性的虚假幻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普世价值”、“历史的终结”等概念的鼓噪无非是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永恒的最为美好的社会制度,这当然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是资本的强势逻辑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构造的文化陷阱,是全球性文明冲突与文化风险的深刻根源。

4. 资本逻辑与全球生态风险

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性及其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实践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已经达到了全球控制的程度,同时,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也升级到了全球水平并以种种具体可感的危机事件的频发向人类昭示了当代人类发展中生态风险的严重性及其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后果。虽然各种风险问题都依赖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建构和认可,但是当代生态风险的客观存在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共识。曾以博大的胸怀哺育了人类的自然界之所以在当代变成了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全球扩展的必然结果,是当代生产的全球化和高度科学技术化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⑤ “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⑥ 以无限度地追逐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待自然的态度及其依托的科学技术手段,在现代化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埋下了生态风险的种子、积累了生态风险的力量。在原始狩猎采集的时代和农耕文明的生产实践中,自然被看成养育人类的母亲和人类生产的榜样,人们仿效自然、引导自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机器生产使自然祛魅化,自然本身被看作人类可以依其需要进行任意拆卸和组装的机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⑦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利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掠夺从而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限度,就绝非偶然发生而是必然的结果和趋势了。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风险受到了特别关注,被认为是最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科学研究表明,这是由于人类燃烧石化燃料排放在大气层内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量积聚造成的,但力图快速致富的资本逻辑决不会轻易改变它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当今生态系统失衡、紊乱甚至崩溃的危险就根源于资本攫取利润的贪婪逻辑。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运行和动态均衡本身是有极限、有条件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速度是有限的,整个生态系统净化和容纳工业废弃物的能力、维持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工业化以来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人类利用自然的高度技术化方式使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脆弱性日益显露出来并与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本性相矛盾。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我们需要经

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要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②0} 20 世界中期以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广度和深度上实现了又一次飞跃,它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较近或较远的影响更加难以估计和预见。对于当代各种生态风险的加剧仅从科学技术的“双刃利剑”效应来说明并不能揭示其根源,因为现今高科技知识的生产和应用无非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要素和必要环节,科技进步背后的根本性支撑力量仍然是资本逻辑和国家利益。

三、发展风险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对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根源及生成机制的深刻揭示,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正义性提供了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同于传统基于财富分配逻辑和贫富分化话语系统的,另一种更富于时代气息且贴近于每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新支撑和新论证。由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性及其全球化进程并非一个不断创造繁荣、福祉与和谐的文明传播过程,而是一个始终交织着富有与贫困、希望与不幸、征服与抗争、进步与危机的辩证历史过程。与民族国家和工业制造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比,现今全球的、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一方面,它给人类创造了新型的现代文明,使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和新高度并且进一步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方面,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扭曲和颠倒,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了风险、危机和灾难。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教条式地预料未来,但要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1} 当代人类文明所遭遇的种种全球性风险境况表明了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可欲性、合理性和正义性。

对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马克思哲学考察全部现代社会问题的理论制高点。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从而整个社会生活受资本控制的状况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宿命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由资本逻辑推动的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全球化既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又有历史的局限性。资本使人类实践活动超越了自然和社会的特殊性,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从而把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推进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并为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自由个性”创造着条件。“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样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②2} 当代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程度的高度增强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但是,资本是通过不断地把自身内在矛盾普遍化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资本内在矛盾的普遍化在当代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它的极限。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②3} 在资本发展的当代全球化阶段,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风险的激增及突如其来地向现实危机的转化不断地警醒人们:资本逻辑既非永恒更非至善,因而要在现今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逻辑进行彻底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

既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性扩展、资本逻辑的当代强势运行是目前威胁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风险的总根源,那么,从根本上来说,要超越风险就要超越资本,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化,这当然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和磨难。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4} 当代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性的普遍交往在现今资本关系的狭隘制约下不断积聚风险和灾难的现实,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诉求极具历史的穿透力而重新焕发了思想魅力、彰显了其当代价值。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

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⑧共产主义运动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及其能力发展的前提下,要求把以资本实现价值增值为基础的生产转变为以人的一切欲望的正常满足为基础的生产。“作为某种‘愿望’的基础的任何一种需要,也都是某种‘僵硬的’东西……共产主义者就没有想过要消灭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的这种僵硬性……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只是这样一种生产和交往的组织,那里他们可以实现正常的,也就是仅限于需要本身的一切需要的满足。”^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愿望的设想隐含着对资本逻辑操纵、控制、奴役人的欲望的批判和控诉,倾注了对人的欲望的本真性、丰富性和正当性及其得以解放和实现的条件苦苦索求,重建被资本抽象化的生活世界,反求诸己,以社会主义的人本逻辑反思批判并超越资本逻辑才是应对全球性发展风险的根本进路。

马克思认为,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弥合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实现联合起来的普遍性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才能使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到满足人的一切正常需要上来,从而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超越,开辟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马克思设想,“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⑩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还在继续发展,实现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整个实践方式的共产主义转变还只能是一个远景预期,但资本运行于其中的当代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国际条件已经为利用和限制资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和空间,这就需要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限制资本对利润的贪婪,对资本的逐利活动进行恰当的控制、调节和规范,不断增强全球体系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力量。破解全球化高速行进中发展风险丛生而又无人责任的困境,强化国家之间的国际责任、每一代人之间的代际责任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生态责任,甚至每一个人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利益算计的考虑,进入了人类整体及其内在的本质属性的广阔空间,为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赢得了新机遇、注入了新活力。

[注释]

①①②④⑨⑩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第274-275页,第274页,第287页,第228-229页,第773页,第773页。

②③⑦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0页,第174-175页,第831页,第11页。

④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第25页。

⑤⑬[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第365页。

⑥⑤⑦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第24页,第393页,第393-394页。

⑧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第401-402页。

⑪⑫[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第69页。

⑮[法]让·克洛德·德洛奈《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上)》刘英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0期。

⑯⑰[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第166页。

⑱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第384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页。

㉑张再林《真问题 还是伪问题?——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㉒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77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㉔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第31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7页。

[责任编辑:杨晓伟]